

当春节遇上国潮

华梅



网络时代,一切都可以很快捷,一切也可以很虚拟,但是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,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,讲究仪式感的民俗也越来越有人气。尤其是21世纪的年轻人纷纷穿上汉服,弹弹古筝,写写毛笔字,背诵古诗……形成了全方位的国潮。

过年期间走到哪里都有浓浓的春节味儿。大红的灯笼、红纸黑字的春联,还有那些穿着红衣红袜的售货人员……根深蒂固的大年气息依然活跃在华夏大地,这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真谛。

民俗可以随时代而更新,方式更可以在守正创新中得以不断推出新花样,只是中国人过自己的大年时那种情景,那种文化深处的沉浸是不可忘却的。

明代贡生彭孙贻有《小年夜词》:“今年今日倚春娇,梳得云鬟懒上翘。斜插柏枝花一朵,旁人说是小年朝。”古时吴人将正月初二之夕定为小年夜,新正三日为小年朝。这首诗的后半部有一句“五色彩笺频照影,喜看百子映红椒”。古代中国人也喜欢用柏树枝做配饰,插在头上或别在襟前。因为“柏”在汉语谐音为“百”,所以“百子”是子孙兴旺的吉庆词儿。西方的圣诞老人乘坐鹿拉的雪橇,而中国的老寿星也是骑着鹿。“鹿”谐音为“禄”,可以理解为俸禄,也可以寓意长寿,占有“鹤鹿同春”的吉祥用语。西方肯定不是这个谐音,他们有多种相关传说,总之鹿是有些神仙气儿的,这说明人类之间有许多契合之处,希冀美好、向往富裕是一个共同的愿望。

旅游需要文化,国潮也需要文化,而文化不仅是红衣红饰红花,更重要的是丰富的内涵。彭孙贻《小年朝词》中有这样的诗句:“宜春翠称安翘,花滚红裙未消。侍女簪漫收放,今朝正是小年朝。”“三朝新岁两朝霜,晓起轻寒压闹妆。更启巾箱上眉帖,春山暖入紫貂长。”清代沈钦本《拜年诗》,一开头“熏炉灰暖烛光紫,连街爆竹开门喜。闹中搅镜插边花,厨下注汤淪园子。主人衣冠斗簇新,拈香先拜家宅神……”我们的先人为什么讲究过年要新衣新帽新鞋?是为了新年能有新气象,忘却头一年的某些不如意,从而以新面貌新形象迎接崭新并幸福的来年。拜年词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,不忘祖先,不忘中华之根脉,春节正是一个关键节点。

农历正月七日,谓之“人日”。唐代风俗是这一天女子要穿戴相应的服饰。温庭筠在《菩萨蛮》中写:“藕丝秋色浅,人胜参差剪。双鬓隔香红,玉钗头上风。”既有衣服质材的形容,又有衣服颜色的联想。蓬发、化妆,一应俱全。“胜”是一种菱形装饰,《山海经》里就说西王母“蓬发戴胜”,而“参差剪”则是在说工艺的精美了。最后落到头上的“玉钗”,而且还颇具灵动。

春节突出了一个“春”字,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的情结也是中华文明的亮点。“春盘宜剪三生菜,春燕斜簪七宝钗”,元好问在《喜春来·春宴》中描写的少女发型与头饰,正是突出了人们在春天到来时的喜悦。其中“春燕”是姑娘们头上戴的应时头饰,以五色彩绸为燕戴在头上,邻里之间争奇斗艳。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载:“立春之日,悉剪彩为燕以戴之,帖‘宜春二字’。西晋傅咸《燕赋》中写:‘四时代至,敬逆其始。彼应运于东方,乃设燕以迎至。翟轻翼之岐岐,若将飞而未起。何夫人之巧巧,式仪形之有似。御青书以赞时,著宜春之嘉祉。’”看,中国习俗中有多大的学问!

过春节,我们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;看国潮,我们在新风扑面中看到无尽希望。

满庭芳

第五二七期

我的太子务记忆

高艳华



“二十五,赶大务。”朋友圈里,太子务村的朋友发出介绍廿五赶集的帖子,勾起我的思绪。

太子务村是武清区622个行政村之一。这里的人提到太子务时,发音统统省略了“子”字:“务”的发音,字典上就一个,但如果您到武清找太子务村,直说“太府”就是。我对“太府”记忆深刻,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父母出生的地方,更源于我与姥姥的亲密感情,那是我从7岁到14岁总去的地方。

1962年,我第一次去“太府”,足足住了半年。1966年到1970年,我又断断续续在那里住了一年半,直至实在忍受不了夏天蚊虫过敏和冬天冻伤遭罪,这才返回“太府”人向往的“天津卫”。当时,农村有自行车的家庭就属于富户了,因而“太府”的人骑车去一趟杨村都要兴奋数日,更别提天津城了。

那时候的“太府”,属于河北省管辖,全村约500户人家,与周围村落比很有影响。关于太子务村名的来历,有一个古老传说:辽代有一位太子乘船路过这个地方,天已黑,就将船靠岸住宿此地,因而取名“太子坞”,后衍变为“太子务”。村里有四大姓,村中心姓孟,我姥爷祖辈的家;村西,高姓为主,我爷爷家;村东,李姓为主;村南,张姓为主。孟高李张约占全村一半人口。印象尤深的是,有一孟姓人家,在村里是大户,据说其祖先是几百年前从山东邹县迁徙落户于此的,后人聪睿睿智幽默,尤其追溯到上几代的孟鼎臣,人称孟大先生,是袁世凯儿子的私塾老师,在京城只要有“太府”乡亲找,孟大先生一律热情招待,临走还必塞给乡亲们几块大洋。我还见过孟大先生的儿子孟一民,他早年毕业于北洋法政学校,说一口流利的英语;孟大先生的孙子孟孟乃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武清城关中学的名教师,英语、语文、数学样样能教。

听村里老辈人说,“太府”廿五集始于清代乾隆年间,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这是一年一度的年集,逢这一天,“太府”周边十里八村的农民把自家东西拉到这里来卖,除了做买卖也走亲访友,气氛不亚于大年三十。记忆中的“太府”廿五集非常热闹,所卖的东西相对比较集中,有新鲜的猪肉、羊肉、豆腐、香油,还有各种农作物,以及篮子、簸箕、大锅盔等日用品,农民们来此喜悦地把劳动成果换成钱。伴随着大集,村里还在东学校(太子务小学)操场上组织篮球比赛,“太府”一年四季篮球比赛很多,村篮球队水平胜过周边的仓上、南马房等村,一个叫郑和的村民总当裁判。看得多了,也懂得了一些比赛规则,我喜爱看体育比赛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太子务划归为泗村甸乡;上世纪60年代中期,全村由一个生产大队管辖,大队又分12个生产小队,村中心以东学校为基点。大队支部书记李贵,五官端正,一身正气。50多年过去了,曾经在“太府”插队的我姐姐,如今提起李贵来仍然赞不绝口,那真是一名好干部,还有他身边的杜金露、张文全、李成林、尔全、方连友、范朝友等,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,没有一点私心。李贵总是披着破棉袄到老乡家解决问题,从不搞特殊化,工作之余还要拿着锄头下地务农。他们的家和老百姓的家没有任何区别。

还记得,那时“四清”工作队队员住在我三姥姥家的西房里。有一天我悄悄划开窗户纸,从缝隙中看到工作队的刘姨,现在回想起来,她当年最多30岁出头。“四清”队员日常吃饭由队干部安排,每天交给村民一斤粮票和三毛五分钱,轮流各家各户吃。自然,这个刘姨总在姥姥家吃饭,跟我很熟,只是我这个刮窗户纸的动作令她严肃地问了一声:“谁啊?”“我啊,孟家的外孙女,有事向您反映。”说着我就进了屋。她一脸惊讶问我啥事,我就一五一十地说起来。那些天姥姥家总来一位老人,我叫他陈爷爷,他一来就是大半天。那年冬天异常寒冷,阳光却毫不吝啬地通过玻璃和窗户纸洒满全屋。陈爷爷坐在那里拄着手杖,眯着眼睛好像在享受着不花钱的温暖。他时不时撩开沉重的眼皮跟姥姥说他的难处,我也听个大概,知道大队安排的帮他挑水做饭的人总不按时间去。我说:“有共产党,毛主席在,贫下中农的事就有人管。”陈爷爷笑了,露出来仅有的几颗黄褐色的牙。他走后姥姥告诉我,陈爷爷快一百岁了,无儿无女。有几天,陈爷爷没来,我想到他那双愁容的脸,就一鼓作气,如同捅窗户纸一样把他的事也捅开了。

几天以后,陈爷爷又来姥姥家,步履也轻快了一点。进门就对姥姥说:“这一步头真行,把我的事跟工作队说了,挑水做饭的都来了。这么小的孩子真能办大事啊。”此事不久,姥姥对我说,等你来真能办大事,别忘了给姥姥找一位解放军。她拿出两张照片给我看,照片上是一位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军人,英姿挺拔,精神十足。照片背面的签名是“袁俊田”。姥姥说,快解放的时候,这位军官和他的警卫员从东北四野来到河北省整编,住在咱们家,给我讲革命道理,帮助村民挑水扫地喂猪,帮助大家学习文化,你妈就是那个时候当上妇女主任的。他们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,你妈在东学校代表村民欢送解放军。要不是你奶奶阻止,她就跟部队走了。

姥姥1974年突然病故,我到了“太府”哭着找舅舅要袁俊田的照片,舅舅说以后再找,可几十年过去了,她始终也没找到。后来舅舅说起那年和舅舅结婚,红门帘子还是袁俊田帮着挂的呢。再后来已耄耋之年的妈妈也念叨起袁俊田,说他当年临行前嘱咐她好好学习,送她单行本的毛主席著作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,南下前他还对姥姥说,大娘,只要我活着一定还来看望您。他走后的转年,我妈在天津收到他的来信,信中说自己肝不好。那是1950年的夏季,我妈刚生下我姐,满月那天,她就和姥姥抱着婴儿一起照了两张照片,寄给了远在安徽的袁俊田。但此后杳无音信。2008年,我写了一封《袁俊田老伯伯,您在哪里?》的信,投给《解放军报》,很快军报刊出

关于读书,很多人提出要读纸质的书,不能读电子书。好像读纸质的书才是读书。读书读的是什么呢?读的是内容,而不是载体。纸和电子屏幕都是媒介而已,呈现出来的文字,该是《红楼梦》还是《红楼梦》,该是儿童读物也还是儿童读物。说起《红楼梦》,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位大学者讲课,他说,读《红楼梦》怎么也得看纸质书吧?作为媒介,书的内容曾经在布帛上、竹筒上、石头上、铜柱上,如果一味想复古,纸张都显得不够资格;向未来看,电子阅读不仅完全可行,甚至可以取代纸质书。纸质书曾经是新鲜事物。

现在网络发达,电子阅读软件非常多,装在手机里,拿在手里,方便快捷。曾经流行过阅读器,单一功能就是读书,现在更常见的是用手机来读,不少手机功能强大,画面清晰,和纸质书比起来更方便携带,载体不同,阅读的感受不一样,但阅读的内容没有两样。手机阅读比电脑又灵活了一些,台式电脑会把人固定在房间里,而就算笔记本电脑,也在拥挤的人群里也不方便打开。手机就不同了,在局促的环境里,如在嘈杂的地铁上,至少可以把手举高,有一个手机屏幕,能阻挡扑面而来的焦虑的呼吸,能把那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。如今,手机已经是重要的工具,很多人须臾不能离开。可是谁只要看手机时间过长,还是要被“恶狠狠”地称为:玩手机。也难怪有人一天到晚拿着手机不放,手机里的各种功能,比如微信,除了是社交工具,也是重要的传输工具。替手机一辩,手机不就是沾满了我们各自的汗渍,带有一定体温的伙伴吗?能用来支付、聊天,当然也能用来阅读。一味批评手机阅读是碎片化阅读,这是不客观的。在手机阅读“狙击”传统阅读方式之前,人们也是在进行所谓的碎片化阅读,时间并不长,但很多人好像已经都忘了。那时候街头的报刊亭红红火火,人们手里拿着的,除了不同类型的都市报,还有五花八门的文摘杂志。就连恋爱中的男女,也把青春杂志作为有效的“武器”,互相分享读物或者鸡汤文,朦胧中尚未捅破窗纸的男女,互相借阅图书,夹带信件,传递情意,就像现在的朋友之间也会转发一些电子书的文章,情况没有什么区别。既然说开卷有益,那么用手机阅读也可视为一种“开卷”方式,如简单将其归为碎片化阅读,颇有值得商榷之处。传统的读书卡片是不是碎片化?抄写在笔记本上的名言警句是不是碎片化?零星时间看系列散文家的文章是不是碎片化?背诵一首一首的唐诗是不是碎片化?《全唐诗》好多卷,也只能用所谓碎片化的时间和方式去阅读背诵,少有人用一个集中时间去背古诗,都是碎片化地用一生的时间读诗品诗。况且,什么是碎片化?所谓的碎片化其实是被充分利用起来的零星时间。只要去阅读,就是开卷有益,不管是纸质阅读,还是电子阅读,工具不重要,重要的是阅读的内容。

读内容,不是读载体 杨仲凯 沽上丛话

书法家田蕴章、田英章兄弟俩的字很像。1968年,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我有机会和姜大叔为全村500户家庭写对联,用红黄两色油漆写在门框上。我们准备好两色油漆小桶,姜大叔提一个,我提一个。我出词,他刷漆底色,等油漆干了再写字。他从没有对我这个十几岁小女孩说的词产生过半点怀疑,我说什么他就写什么,我力求500户不重样。那些天和姜大叔在一起写对联真是快乐,我向他学习书法,收获不小。

我回天津上学的前一天晚上,姜大叔闻讯来到姥姥家小门口,隔着简院院墙的缝隙,塞给我一本小字帖,嘱咐我好好练字,将来一定有出息。多年来家里不少字帖都不知去向,可姜大叔送的这字帖至今珍藏着。几年前我再去武清,与姜大叔的妹妹、年已79岁的姜老姑联系上,才知道姜大叔叔不遇,一生坎坷,最后抑郁而终。想起那年我跟着他走街串巷写对联,他实足年龄仅35岁。我恨自己这些年忙于工作,忘了亲情乡情。如今我也到了古稀的门槛,发现早该报恩的,叙旧的,回访的亲友,一个个竟然都陆续离世,留下的是无限的惆怅与回忆。

太子务给了我朴素的世界观,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怀着一颗淳朴的心看世界,待他人。从小就近距离接触农民和农村,让我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,从不与人攀比。如今的武清,村村通公路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实现了,公交车直通“太府”姥姥家的旁边,遗憾的是,姥姥去世早,没能看到她梦中的愿景。当年姥姥从“太府”到天津,需要走12里早路到落堡车站,再由落堡站坐绿皮慢火车两个多小时到天津东站。如今她的子孙们开车不到40分钟就从武清进入市区。时光荏苒。看朋友圈的介绍,今年春节“太府”的年集从腊月二十五持续到正月初九,不仅可以赶集购物,还有热热闹闹的庙会。我重返“太府”的理由又多了一个。难忘太子务,难忘廿五集,难忘我的乡亲和故土。

难忘太子务,难忘廿五集,难忘我的乡亲和故土。



龙年大吉(中国图) 赵士英

原法国俱乐部:几经变迁的文化场馆

罗丹



近代天津开埠后,外国侨民逐渐增多,俱乐部(亦常译作“总会”“球房”)作为社交、文化娱乐的团体和场地,开始在各租界兴建。俱乐部有别于一般的消费场所,集议事、饮食、展览、演艺、健身运动等功能于一身,成员多为具有共同兴趣的特定会员,或由国别、职业身份界定。作为典型的文化娱乐类近代西洋建筑,天津的外国俱乐部建筑多集中在中街(今解放北路及解放南路北段),如英国俱乐部、美国海军俱乐部、德国俱乐部。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当数原法国俱乐部,因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长期作为天津青年宫使用,是全市广大团员和青年开展文娱活动的主要场所。其建筑后又被开辟为金融博物馆,在这条有着“东方华尔街”之称的解放北路上,成为展示和解读天津金融历史文化的新平台。

法国俱乐部是法国商人议事之所,也是法国侨民的娱乐中心。法国著名军事家、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军总指挥约瑟夫·霞飞(在中国习惯称其为“霞飞将军”),曾于1922年访华期间专程访问天津;3月4日上午,霞飞抵达天津东站后,在法国领事官陪同下驱车过万国桥,先后在英租界红墙外法国官营参团阅兵典礼,在法租界法国公园参加竖立战胜纪念典礼。中午,霞飞来到法国俱乐部,受到法国侨商及各界人士欢迎。霞飞发表演讲后,有天津中国商会代表上台致欢迎词,并赠送宝剑一柄。《大公报》记者向霞飞赠送了该报当日出版的“欢迎霞飞大元帅来华特刊”。当天,在法国俱乐部外部的法租界中街上,特意临时搭建了一座双门洞的“得胜门”(凯旋门)。此门为仿石门形,由苇席搭盖,外用灰色纸彩画而成。全市机关、商店、学校悬挂国旗表示欢迎,各国洋行、银行也为此放假一日。此外,为促进中法文化商贸沟通,1923年法国商业展览会(法国出品货样陈列所),在现存原法国俱乐部所在地块上的老建筑中举办;这年10月12日晚间,驻华法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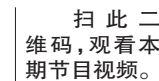
商会天津分会曾在法国俱乐部举办开幕礼宴会。1946年7月15日,法国俱乐部改为盟国俱乐部,旋即更名为“胜利联欢社”。胜利联欢社旨在促进“国际团结”“友情合作”,延续了原法国俱乐部的功能,成为法国人社交活动的首选场所。1946年10月,为欢迎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雷携夫人来津,法国驻津领事莱格瑞与夫人在胜利联欢社举行宴会。联欢社内有食堂、台球房、纸牌室、图书室、舞厅、酒吧、网球场等,还组织每周舞会、桥牌比赛、乒乓球比赛、音乐会、法国电影招待会及济贫募款等活动,因此成为当时天津各界聚会的重要场所。1946年12月,燕京大学天津同学会约200人在胜利联欢社举行联欢会,欢迎美国驻华大使、燕京大学原校长司徒雷登来津访问。法国俱乐部早期设立在今解放北路与滨江道交口西北向的建筑中。该楼亦称“击剑俱乐部”“剑会馆”,后被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所替代。对角处的原法国俱乐部现存建筑,由法租界工部局于1932年兴建,为单层砖混结构,带地下室。建筑正门设计在街角处做斜角处理,最大特点是门两侧逐渐收分的金色波纹状竖向线条和扶壁灯柱,强调入口的引导性。中间厚重的金色大门,上配大面积金属花饰镂空玻璃,金碧辉煌。各开间处微微凸出,上挑雨罩,下与地下室窗的窗间墙用竖向线条和方块图案装饰。进入内部拾级而上,可经八角形中央大厅便利通达不同房间,厅内各门头均为八字形。厅顶设采光玻璃窗,并悬挂一盏大型吊灯。楼外设有花园、球场等空间,功能完备。建筑外形简洁,比例得当,运用丰富的铁艺元素,体现了19世纪末新工艺美术运动特色。

天津解放后,华北区油脂公司曾在原法国俱乐部办公。1953年10月1日,团市委在设立的天津青年宫开幕。青年宫充分利用原建筑特点,改建后能容纳500人的小剧场,以及舞厅、游艺室、阅览室、业余艺术活动练习室等。舞厅墙壁装有彩色灯光,游艺室内放置台球、乒乓球和各种棋类设施。1980年,青年宫剧场经过改扩建后,舞台面积和座位都有所增加,可接待文艺团体进行整场演出并可放映宽银幕影片。1992年,青年宫剧场及大厅被天津证券交易中心征用。经过改造,青年宫由后操场出入,背靠露天舞台的休息厅扩建为多功能娱乐厅,厅内设电子游戏、大屏幕投影录像等。除日常接待外,天津青年宫还经常举办各种适应青年学习成长的革命历史展览、文化知识讲座等活动。如1963年4月2日,“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”在青年宫展出。展览共分四部分,展出的实物和照片共150件。这些展品是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协助下,将雷锋生前遗物、照片原件,加工影印和复制而成。展览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,全市共计二十多万人参观。1988年,青年宫曾举办著名作家系列讲座,如吴若增讲“关于当代文学的两大主题”,杨润身讲“东观汉记感谈我的文学创作”,航鹰讲“我的文学创作及出

国观感”,肖复兴讲“中学生幻想曲创作谈”等。2010年6月9日,中国金融博物馆(后更名为天津金融博物馆)在解放北路29号原法国俱乐部旧址对外开放。该馆收藏并展出了大量与金融相关的珍贵文物和历史资料,生动呈现出金融业的发展历程。这座几经变迁,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建筑,正以崭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活力,成为珍贵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和启迪人心的文博殿堂。作为历经沧桑,得到悉心保护而又加以活化利用的文化瑰宝,这座建筑将在城市发展中凝聚和释放新的光芒。

《小楼春秋》解说词:

以法国为中心,(当时)欧洲流行一股新的艺术潮流,叫做装饰艺术运动,讲究的是实用、理性。原法国俱乐部建筑整体没有太多的装饰,主要的纹样是几何纹样,还有植物纹样,灵感源于自然界。法国俱乐部建在这儿,为什么没有选择大的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柱子?因为它自身的功能就是一种休闲的、时尚的行为,所以选择了比较摩登时尚、比较流行的这样一种风格。(节选,有改动)



扫此二维码,观看本期节目视频。